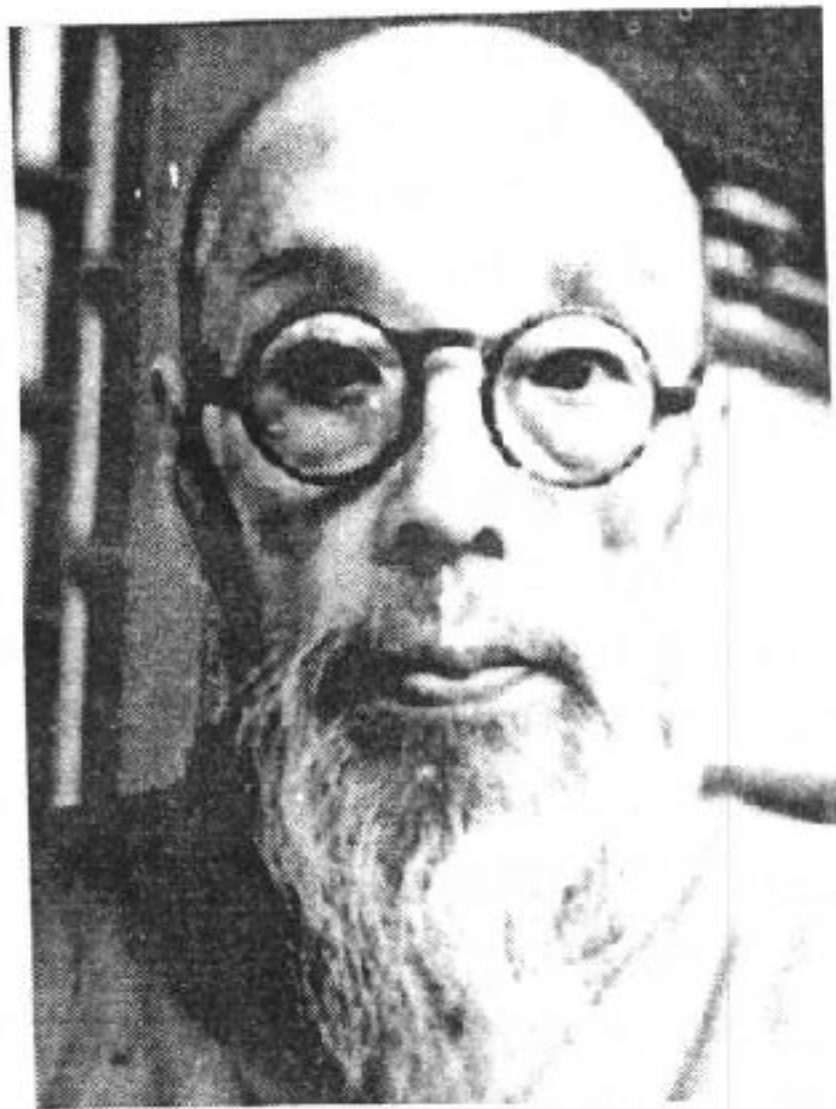


周素园老人的抗日救国活动

□ 陈棻德

1936年早春,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二、六军团。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围追阻截,到达崇山环绕的黔西北重镇——毕节县城。

初来乍到,有的红军基层干部,不明情况。当看见这里一座古雅、端庄的宅院,便断定是“富豪之家”。于是带着战士们进去“打土豪”,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不少马列主义的书,书中密圈细点,红军干部和战士们不禁惊异起来:“地主还读马列”?他们很快将情况向军团政治委员王震报告,王震立即派人将这家主人请来详谈。这人便是贵州有名的“才子”、贵州辛亥革命元老,一生饱经忧患,



周素园先生

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周素园老人,他时年57岁。

他是晚清贡生,1907年曾创办贵州历史上第一张日报——《黔报》,以启迪民智,传播民主革命思想。1910年11月,与张百麟等人一起成功地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,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,被推为行政总理。不久,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接,凶残地颠复了革命政权。他被迫四处流亡,备尝艰辛。

他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,体验、求索,终于认识到共产党是坚决抗日,拯救民族危难的救星,在贺龙、任弼时、肖克等同志的启导和支持下,他毅然出任由红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。历经55个年头后,王震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:“他的参加革命工作,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,这使我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一个月的休整,并扩军五千人。”

红军继续北上抗日,他不顾自己年老、体弱、多病,坚决要求随军行动。踏崎岖野径,转战乌蒙连峰,经云南,渡金沙江天险,爬大雪山至西康甘孜,向阿坝前进途中绝粮,以啃

草根饱腹,到达草地宿营,他得以下联句:

欹枕未干额上露;

开脸乍见眉际霜。

越岷山,进入甘肃岷州,他被任命为甘肃人民委员会教育部长。

他不畏惧于蒋介石的屠杀政策,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抗日救国夙愿。1936年暮春,他随红军途经云南时,运用旧时关系,给龙云(时任云南省主席)、孙渡(滇军将领)、鲁道元(旅长)写信,希望彼等继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,以民族大义为重,支持红军抗日,而不助纣为虐,为蒋介石火中取栗。龙云接信后,一方面把他的信件摄影呈报蒋介石;另一方面,也从自身利益考虑,放松了对北上抗日红军的堵截,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金沙江。

这年7月下旬在下甘孜,他通过电台广播,向国人揭发蒋介石降日妥协的卖国政策,呼吁各省人民起义抗日。

这年12月2日,他到达保安,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待。同年12月底,他来到延安,亲睹革命抗日圣地的许多新气象,看到祖国和人民的新前途,他的精神更加振奋。在给家人的信中,他动情地写道:“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完全两样,对于种种关系,都看得极空阔、极潇洒,把旧日那些迂谨固执性格烟消云散了。”同时,他还写了两首七律,寄给家人。

其一:

艰难尝尽好归田,退老闲居十二年。
漫信山中能避地,翻从井底得观天。
强权胜后人无类,学道成时犬亦仙。
为导迷盲遵觉路,敢辞残废着先鞭。

其二:

慈悲只是口头禅,遗臭流芳两漠然。
祖国山河甘断送,吾曹兄弟苦颠连。
前途展拓凭金甲,大任担当要铁肩。
可有还童真妙术,让余腾步学高骞。

(注:高骞:即展翅高飞。)

这两首诗,深刻地揭示了他参加红军的经过和心愿。批判了国民党当局在抗日御敌上的妥协、投降。形象地表露了自己愿在党的英明领导下,返老还童,振翅高飞,为拯救民族危难,坚决抗日的雄心与毅力。读之令人感动。

在延安,他一面如饥似渴地继续学习马列著作;一面抓住空闲努力写作,应红军大学之请,他写出了《洪宪叛国记》作为教材,还为纽约新历史社征文,写了《世界人类如何才能完成普遍裁军》。

在此期间,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逼蒋抗日的“西安事变”,他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旨意,运用自己往昔的种种社会关系和渠道,分别给张学良、何应钦、王伯群、吴忠信、朱绍良等人写信,传达共产党的正确主张,为和平解决“西安事变”,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,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,作出贡献。1937年初,当国共合作谈判陷于停顿时,他又给张道藩、冯自由、张继、冯玉祥等写信,以推进谈判进程。

在给黔人张道藩(时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、后任中央宣传部长)近3000字的长函中,他坦诚地叙说了自己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动机和衷情,他写道:“为什么杜门十二年忽然参加了红军,这就不能不说是南京的抗日政策逼我走上了这条路。‘九·一八’以来,四、五年间主权领土丧失几何?而政府一次退让,三次、四次仍是退让。我觉得与其垂老而当亡国奴。不如同情抗敌队伍,把我这根老骨头投掷荒原,或可对麻木懵懂的群众刺激一下,使大家赶紧觉悟,一致救国”。在最近出版的《周素园文集》中,当我这个黔西北后生于深夜捧读到这段文字时,不能不被这位乡贤前辈,当年如此炽烈的抗日救国情怀而深为倾倒。

“七·七”抗战爆发后,他受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,他曾有“执戈以从”义赴国难的要求。

但自8月以后,他两脚红肿,体质更弱,他为自己“坐享优待”、“尸位素餐”而内疚。

其后,针对新的形势,他萌发了更为实际的念头,主动要求返回大西南,从事地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,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。毛泽东主席同意了他的请求,他遂带着毛泽东、朱德的亲笔信离开延安。抵达重庆后,他先后三次致函贺国光(时任国民党政府重庆行营参谋长)。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后的新局面,要求释放红军战俘及其他“政治犯”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委座历次谈话皆主巩固统一,精诚团结。此辈血气青年,国家既待以不死,正可使之效命疆场,增加抗战力量”。又写道:“盖以最近战局形势,为国家为民族均宜爱护抗敌力量,化无用为有用,增一分算一分”。对他的三次致函,贺国光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,既不答复又拒绝会晤。他旋去成都,洽谈却颇为顺利,他受聘为四川省政府顾问。四川代理省主席邓汉祥,在他敦劝下,决定汇去法币四万元以补助陕北公学办学。在四川欢迎九世班禅的宴会上,他结识了四川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人张澜、胡景翼,他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,他们十分乐意地把他从陕北带来的彭德怀论游击战的小册子,大量翻印,送给大后方群众阅读。

1938年1月,龙云接到他和他受毛泽东之托带给云南当局的信函后,两次来电邀请他去昆明,他受聘为云南省政府咨谋,在昆明逗留80余天,他作了不少支援抗战的工作。他把西安寄给他的一些革命理论书籍给郑一斋、徐嘉瑞、刘惠之等人学习,鼓励他们举办进步的座谈会。他介绍了革命青年朱家璧、张子斋等人去延安进行深造。他在昆明还为浴血奋战在极端恶劣环境中的八路军战士,募集治伤特效药——云南白药二万余盒,邮寄西安,转送前线。

在昆明每天来访、询问延安和抗日前线情况的客人平均总在20人以上。于是恼怒了云南当局,后由老友胡蕴山告诫他:“再不识相,就不客气了”。这样,他回到了故乡贵

州,行抵贵阳,这里早得到特工报告,对他布置防范,贵州省党部负责人陈惕庐警告他说:“你最好是回原籍养病去。”于是他隐居毕节乡里,清贫自守,一方面闭门读书,另一方面关注时局。不久,当选为省参议员,而活动国民参政员和省副议长均告失败。1941年他在家里写成《贵州陆军史》,并任毕节县志总纂,还积极参与地方办学,讲学,为桑梓培养青少年。

他返乡之初,一病七旬,病中还惦记着贵州籍的抗日将士,他曾给当时在武汉前线抗击日寇的86军军长何知重写信,建议何采用治军新策,以增强抗敌力量,他在信中说:“大抵军队必须与民众切取联系,而平日政治工作尤宜特别加意。积极倡导各单位的自我批评,不断的检讨弱点,改正缺点,战斗力自逐步加强。”

在此期间,他还为102师贵州籍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写铭,铭文中他高度赞扬贵州籍的将士为国牺牲的精神,铭文结尾部份,他写道:

黔于行省号旁边,豪杰间生古固然。
万人心死摧强权,史册光芒见新篇。
日可倒兮海可填,血肉拼与钢周旋。
丹心耿耿昭日月,千年无名何须金石镌。

1944年,他当选为国民参政员。

在十分险恶、复杂、艰困的环境中,他为抗日救亡,为团结进步,为民主,为真理,勇于探索,勤于实践,努力奋斗,尽心竭智。毛泽东主席赞誉他是“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”,“一个奋斗的人”。

1945年8月,他在故乡,终于迎来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
1949年10月,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11月迎来了家乡的解放。解放后,他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委员。

他一生著作不少,功绩突出,贡献卓著,于1958年2月1日辞世,享年79岁。